

清代 云南绿营兵 研究

——以汛塘为中

秦树才 / 著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云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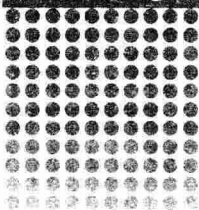
清代

云南绿营兵 研究

——以汛塘为中心

秦树才 / 著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秦树才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3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I. 清... II. 秦... III. 军制 - 研究 - 云南省 - 清代
IV. E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939 号

责任编辑：李 旭

封面设计：向 炜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

秦树才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30 000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ISBN 7-5415-2509-X/E·1 定价：14.00 元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总 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从 1981 年开始实施到现在，整整 20 年了。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专业点之一，也是当时云南省惟一的博士学位授权点。

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应该归功于“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教授。创建一个博士学位培养点和授权点，关键在于有一位杰出的学术领导人。学术领导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师，而是导师们的导师。方国瑜教授在中国民族史、民族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云南地方史等领域，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学术权威。作为学术领导人，具有学术权威诚然是先决条件，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有正直的道德品行、独立的人格操守、高尚的学术品德，不追名逐利、不畏权惧势、不趋炎附势、不媚俗随时。做学问就是做人，做人过不了关，所做学问通常也难以经得起检验。方国瑜教授时常说：“所有知识都是属于社会的，来自社会，归于社会，非个人所得而私有，乃通过个人劳动，在已有基础上增益新知。”他信守的格言是：“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对于方国瑜教授，尊

重前人成果，严守学术规范，已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自觉的行动。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在学术园地耕耘，不论乌云压城还是浊浪翻滚，不论党同伐异还是流言蜚语，他始终坚定不移、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奋力前行，终于成为一代宗师、一代昆仑。方国瑜教授在学术上的献身精神以及对本专业发自内心的挚爱，成为学子的楷模和表率；神圣的敬业精神和严正的学者风范铸造了他自身人格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少学子慕名投身他的门下。自他执教于云南大学以来，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几代学者，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中不少人已成为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学术领导人。

方国瑜教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创办中国民族史教研室时，江应樑教授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诸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江应樑教授原来是从事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教学的，他擅长田野研究。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德宏、凉山、西双版纳等民族地区做田野研究，写成《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文化生活》、《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等人类学（民族学）的传世之作。江应樑教授加盟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将人类学、社会学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和他自己从事田野研究的丰富经验带到民族史研究中，提出“人类学与民族研究的结合”的命题，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史研究与人才培养做出了新的贡献。五六十年代，他和方国瑜教授一起，培养了三届七位副博士（硕士）研究生。60 年代，他与方国瑜教授一起编写《中国民族史讲义》三大册。80 年代末，他主持完成《中国民族史》的编写工作。这套书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方国瑜逝世后，江

应樑教授成为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的领导人。他培养了十数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生现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成为新一代的专家、学者。

尤中教授 195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他从方国瑜的学生成为方国瑜的助手，进而成为蜚声中外的教授。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尤中教授在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的田野里勤勤恳恳地耕耘，不仅著作等身，还培养了数十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以骄人的成就，成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开创中国民族史专业，筚路蓝缕，备尝艰辛。在众人追赶热浪的时候他却自守“冷门”。尽管当时被人讥讽为“政治觉悟不高”、“白专典型”，他也置之不理，依然孜孜不倦地认真做学问，真正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他在《滇史论丛·自序——略述治学经历》中回首往事时，不无自豪地说：“1954 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乃于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之创举，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方国瑜先生的《略述治学经历》是在 1980 年写成的。20 年过去了，薪尽火传，一代新人继承方国瑜先生的遗志，在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中坚持不懈地努力，取得了新的成果。从方国瑜培养中国第一个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开始到现在，云南大学已培养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三十余位。

这些研究生以方国瑜先生为榜样，潜心学术、淡泊名利，对所学专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豪感，并将这种感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强大动力。

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老一辈学者为云南省以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史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在云南学术史上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新一代的博士们，有比前人更好的社会条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理应做出更大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史学不是一门可以很快普及的学问，要入门不容易，登堂入室就更难，需要长时间的坚韧不拔的努力，需要百折不挠的精神，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需要清醒冷静的钻研。我毫不怀疑，新一代的博士们定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优秀的学术传统，在新世纪创造出无愧前人、无愧时代的新成果。

现在，我们从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论文中，选编一部分博士论文出版。这些论文，经过同行专家严格、认真的评审，并通过资深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答辩，现在，作者又作了修订。不是说，这些论文都已尽善尽美，但毫无疑问，这些论文都是同行专家们一致肯定的创新性成果，都遵循了方国瑜先生“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教诲。

这些博士论文出版时，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已不及见了。这些博士论文的出版，标志着方国瑜先生期盼的民族史研究的繁荣景象的确已经到来。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九泉有知，当感无限欣慰。他们也会鼓励我们：学无止境，应当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不断进取。

林超民 谨识

2001年6月于云南大学补拙斋

《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序

林超民

树才的博士论文《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经过修改充实后，即将付梓刊行。这是清史研究、西南民族史研究、云南地方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成果。之所以这样说，并非我个人的偏爱与溢美，而是云南学术界的共识。当老师的时间长了，有种“职业病”：对于学生的作品总是批评多于赞扬，严格多于宽容，有时候近乎苛刻的挑剔使不少人难以接受。在读方国瑜教授的研究生时，我深受他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严谨踏实的治学与教学风范的熏陶，深感高标准、严要求对于学生成长的好处。所以，尽管我十分喜欢学生的作品，总是要严肃地给他挑一些毛病，不客气地提出意见，很少夸赞。树才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并获得好评是意料之中的，但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赏和格外推崇，则是我没有想到的。

云南师范大学的朱端强教授认为：“这是一篇用功颇深，‘精雕细刻’的学术研究论文。从资料上和学理上填补了清代军事史、中国边疆史和云南地方民族史的诸多空白。”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历

史系主任林文勋教授指出：清代绿营兵的研究“缺乏区域性的具体深入揭示”，秦树才的这篇论文首次对清代绿营兵“做区域性深入研究，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在深度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对清代军事史和云南边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颇具学术价值”，“是具有创见和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博士学位论文”。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王文成研究员强调：“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巩固国防，对全省、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云南兵制史，特别是对经济快速发展、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国际格局和边防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清代云南兵制进行研究，探讨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原因，阐述绿营兵制演变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秦树才的论文“资料翔实，考订精当；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立论稳妥，论据充分可靠；逻辑严密，层次分明；行文流畅，文风严谨。通过对清代云南绿营兵制及其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观点”。

云南师范大学的李寿教授在肯定秦树才的博士论文“是一部具有创建性的、内容厚实、体例规范的成功之作”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论文显示出作者具备深厚的史学研究功力，掌握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娴熟的写作技巧。论文立论审慎，评说公允，论据可靠，论说充分，逻辑性强，谋篇布局、遣词用字都甚为得当，堪称优秀”。

审阅过这篇论文的专家学者如云南省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古永继教授、云南大学方慧教授、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何磊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的徐兴祥教授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言辞对这篇论文给以相同的肯定评价和公允的由衷赞赏。

由云南大学研究生部主任王文光教授为主席，云南大学木芹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王树五研究员、云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李惠銓编审、云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鲁刚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在严格审查和严肃答辩之后对秦树才的论文做出如下评价：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巩固的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绿营兵以布置汛塘作为控制全国的主要手段，清王朝在云南布置的绿营兵数额居全国各省前列，清代云南边疆的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人口与民族的发展变迁与云南的绿营兵及汛塘制度密切相关。秦树才同学选取清代云南绿营兵及汛塘制度的发展变化情况及其作用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国边疆史、兵制史、移民史、清代史的研究，而且有益于清代地方史和民族融合史的探讨，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学术界对这一课题虽有所涉及，但仍有深入拓展的空间。作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阐述、分析清代云南绿营兵的兴衰历程为前提，以汛塘制度研究为中心，以绿营和汛塘制度在清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为指归，深入、系统、全面地作了考究和论证，将绿营兵和汛塘制度的研究扎扎实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近年来云南地

方史研究难得的新成果，是清代云南兵制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论文在准确把握学术界有关绿营兵和汛塘制度研究学术背景的基础上，广泛收集了实录、档案、正史、奏议、方志、文集等大量分散在史籍中的相关史料，作了精密梳理、审慎考订，全文引证浩博，巨细必察，立论允当。将定性论证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采用精密的统计方法对绿营兵的编制、耕地面积、汛塘关哨设置情况等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揭示了绿营兵和汛塘制度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巩固边疆开发边疆所起的独特作用。

论文多有创新之见，如对清代绿营兵为土著世业兵制的驳正，以大量事实和数据论证云南绿营兵不仅大多来自外省，且数量巨大，在云南形成了三种类型的移民的观点，的确是清代兵制研究和云南地方史研究值得肯定的创造性成果。”

树才的论文，不仅有以上诸位专家学者实事求是的中肯评价，而且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一致好评。树才因这篇博士论文“脱颖而出”，引起同行的关注以至刮目相看。在此之前，树才几乎是默默无闻地在认认真真地读书，孜孜不倦地在踏踏实实地查找资料，勤奋不辍地在仔仔细细地考证史料，坚韧不拔地辛辛苦苦地思索问题，持续不懈地勤勤恳恳地撰写论文。这是一段漫长、艰难、孤单、寂寞甚至痛苦的时期，但是，树才甘之如饴、乐此不疲，仍旧一往无前地在学术的崎岖山路上攀登。

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树才不在意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在意职称职位的晋升，不是为了尽快获得学位而挑选“短平快”的项目，更不投机取巧，寻求成功的“便道”、“捷径”，而是从学术发展史上寻求具有重大价值、深远意义、学术含金量高因而难度也大的课题研究。自入学以来，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潜心学问。所以，他的论文得到学者一致的赞扬是应有之意，毫不意外，也毫不奇怪。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天道酬勤。”

环顾当今的学术界，树才这样“自找苦吃”的治学方法和路径，真有点像“出土文物”一样珍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的号角，催动了多少人的狂热，学术界出现了急于求成，只讲数量不顾质量的局面。翻检当时的报刊杂志，看看大跃进中激情涌动的学术理想、学术规划、学术口号令人忍俊不禁。今天，荒唐的大跃进已成为令人心酸的笑话留在史册，可是如同儿戏般的“大跃进”正在以新的方式，披上时髦的外衣，在当今的学术舞台上表演：不顾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简单的现代工业生产线的操作方式，假设或规划学术研究的目标，要求学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规定的刊物上发表相当数量的论著；每一年的学术产量成为晋升职称的惟一标准，近三五年的学术产量则是担任博士生导师的不二尺度，学术数量的要求取代了学术质量的追求。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和学者对功名利禄的迫切需求，给学术界带来的不仅是观念上的变化，也带来了心态上的浮躁。以学术名义进行非科学和非学术的活动成为新时代皇帝的新衣而风靡一时，学术泡沫与学术腐败不再是惊奇的新闻。令人担心的是，时下的学术发展，有可能成为出版著作、发表论文最

多的岁月，也是产生传世经典最少的时期。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与严肃谨慎的创造精神，就显得格外必要。我们赞扬树才的著作，更要赞扬树才为人治学的品格。希望优良的学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树才具有优良的学风并非偶然。他在云南大学历史系著名经济史专家李埏教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既得名师精心培养、着意点拨，加之他本人严格修身、勤谨治学，所以人品和学问与日俱增。

树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正在编辑五卷本《方国瑜文集》。他协助我收集文稿，认真核对每一条史料，仔细校正每一篇论文。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投入了许多精力。为了保证《方国瑜文集》能在方国瑜百年诞辰时间问世，他推延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日程，把原定三年的学习时间改为四年。他从头到尾通读了方国瑜先生的所有论文并精心校对、精心核实。从中他学习到了方国瑜先生的治学精神、治学思想、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方国瑜先生每一篇纯正经典的学术论文都闪耀着创新的火花、务实的精神、求真的勇气。他沉浸在方国瑜先生用毕生精力谱写的学术交响乐中，受到熏陶，得到洗礼，经历升华。方国瑜“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治学格言，成为他为人治学的内在自觉与自觉实践。他没有亲自得到方国瑜的教诲，但是他是认真通读方国瑜论著的为数不多的学人之一。在他的协助下，五卷本《方国瑜文集》在方国瑜百年诞辰时得以出版发行。方国瑜先生已不能见到这套凝聚他一生心血的论文集的刊行，如果他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定会感谢树才为文集出版所做的一切。树才的博士论文也是在方国瑜百年诞辰之年问世的，方国瑜先生九泉有

知定会为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而无限欣慰。

方国瑜在78岁回顾治学经历的时候说：他在云南开创的中国民族史与地方史学科，“原是底子薄，且以往限于个体小生产方式，较之其他学科处在更落后的阶段，需急起直追，则惟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始克有济”。他希望后继者“贯彻实事求是原则，长期共同奋斗，发扬而广大之”。现在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已从“冷门寂静之学科”，建设成云南省重点学科，发展为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开创的中国民族史、地方史学科之所以得到不断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成果，就是由于有一批为数不多，但刻苦勤谨、严肃认真、顽强执著、实事求是、不畏艰险、甘于寂寞的学者继承方国瑜先生的遗志，把方国瑜先生开创的事业一步一步推向前进。在这支薪传队伍中，树才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后起之秀。

我不认为树才的论著是无瑕的璧玉，相反，这部著作还有诸多有待提高的地方，有些资料尚欠完备，有些论述尚需深入，有些提法尚待斟酌，有些地方尚要打磨。我想，树才是一位虚心向上、谦恭求教、头脑清醒、追求完美的有为青年，他会在进取、创新的学术之路上，认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也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

赞美树才的论著并不是我写这篇序言的任务。他自己的论著已经在为自己说话。我在树才的论著中看到了大师方国瑜的影子，我在树才的论著中感受到了同样的魅力。树才为撰写论著经历艰难、孤单、寂寞、痛苦，但是他同样在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中享受到了自己的快乐。我相信，没有比一个人在创新求真的研究工作中获得愉快更美好，因为这是学人

人生幸福之所在。方国瑜先生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坚信在新世纪还会诞生像方国瑜一样的大师。新的大师不仅靠传统文化滋养而产生，而且要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新的大师将在中华文化的创新之中诞生。我很羡慕树才和他的同侪们能够参与新文化的创造。

学问不是敲门砖，也不是摇钱树。真正的学术著作不是趋炎附势、装腔作势的八股文章，也不是求荣媚俗、五颜六色、张扬招摇的文字包装。树才之所以能够写出被专家学者誉为“创造性成果”的学术著作，就是因为他能远离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的诱惑，保持心灵的高度宁静，按照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自由自在地在学术天地里遨游。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可能有点寒酸，但在我看来，这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和孤独的美。

经过四年的努力，树才已获得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是一个能够与自己名字终生相连的学位头衔。当树才戴上博士桂冠时，我想再一次重复这样的理念：对于一个博士研究生来说，关键不在于你学到了什么，而在于你创造了什么；不在于你有何成果问世，而在于你有何成果传世。

著名作家董桥说：“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树才的学术论文不是应时的流行歌舞、时尚表演，当然不可能畅销热卖。但是，如果你要深入了解中华西南民族的历史、祖国边疆的历史、清代的历史、云南的历史，你不能不读树才的这部著作。

2003年8月9日于云南大学补拙斋

提 要

绿营兵是清代的主要军事力量，布置汛塘是绿营兵控制全国各地方的重要手段。因此，绿营兵和汛塘制度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巩固的重要历史时期，绿营兵对清代中国边疆的发展、巩固，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绿营兵又是中国边疆史研究必须涉及的问题。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省份，清王朝在云南部署的绿营兵其兵额居全国各直省前列，清代云南边疆的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人口与民族的发展变迁与云南的绿营兵和汛塘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对云南绿营兵及汛塘制度的发展、变化情况及其作用进行研究，有利于拓展和深化清史、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有利于对清代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探讨。

方国瑜先生、木芹先生、林超民先生在其相关论著里充分肯定了汛塘制度对云南边疆和山区开发的重要性，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本书以此为立足点，以阐述、分析清代云南绿营兵的兴衰历程为前提，以汛塘制度为研究中心，以绿营兵和汛塘制度对清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作为研究目的，对清代云南绿营兵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云南绿营兵创建于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 年），康熙元

年（公元 1662 年）其制始备。后历经康熙初年的裁减，康熙二十年（公元 1678 年）吴三桂叛乱平息后的重建，雍正（公元 1723 ~ 1735 年）、乾隆（公元 1736 ~ 1795 年）年间云南绿营兵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的移动，其营制和分布步入稳定发展阶段。乾隆末期，云南绿营兵开始衰退。在咸丰（公元 1851 ~ 1861 年）、同治（公元 1862 ~ 1874 年）年间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的打击下，云南的绿营兵制基本瓦解。其后，云南绿营兵屡兴屡裁，制度频繁更替，兵丁逐渐减少，终与清王朝一道走向灭亡。

存城镇守和分驻汛塘是绿营兵最基本的存在形式。汛塘制度肇始于明代中后期的镇戍制度和以招募形式而组成的营兵制，在清代固定成为绿营兵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绿营兵各协、营驻防区域内都划分为彼此相连的汛地，由千总、把总、外委等官率部分绿营兵（被称为汛兵）驻扎巡防，各汛又在汛区内各交通要道、山险冲要之处设塘驻兵。遍布于各地的汛塘，是清政府统治全国各地的重要手段。清代的汛塘与明代的关哨有密切关系，清代部分汛塘是在明代关哨所在地建立起来的，但关哨为明代建置，在清初即被废除，清代的汛塘之制不包括关哨。

云南的汛塘制度随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 年）后云南绿营兵的建立而形成，随雍正、乾隆年间云南绿营兵向边疆的扩展而日趋完善。道光年间（公元 1821 ~ 1850 年），汛塘制度在云南达到了鼎盛时期。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后，汛塘制度走向崩溃，并最终随绿营兵的灭亡而彻底终结。

绿营兵及其家属形成了由省外进入云南，由云南腹地移向